

粤港澳大湾区智库的区域塑造功能研究

张正良 张树剑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进入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如何以科学化的智库建设推动区域发展成为大湾区治理的新命题。大湾区智库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既有促进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实践障碍。区域塑造功能作为中观视角的切入点，可以回应智库建设与协同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通过建立和调适智库区域塑造功能模型，大湾区智库区域塑造功能的实施现状、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得以系统性地展开综合分析。当前大湾区智库在区域塑造过程中存在分布结构失衡、顶层智库缺位和评估监测不力等问题，需要从加强湾区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构建以智库联盟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建立评估监测机制和鼓励创新性研究与转化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建设；协同发展；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C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4) 05-0068-08

引言

作为我国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的建设已经进入“提速换挡、纵深推进”的新阶段^[1]。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更是为大湾区赋予了“一点两地”的崭新定位。尽管大湾区在基础设施、营商规则和法治体系等方面实现了三地的初步协调和联通，但“一国两制三法系”的特点决定了其观念异质性与文化多元性，这既是发展潜力的思想动因，也是区域协同的深层障碍。因此，构建广泛而稳定的区域共识是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任务。智库作为公共事务的知识供给者和治理主体的决策外脑，具有辅助政府理性分析、提供利益主体的沟通渠道以及架设意见疏解平台等良

性职能^[2]。这使得智库可以成为区域治理生态的中介主体，起到互通有无、弥合分歧的作用，有助于建立深度的区域发展共识，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智库联盟框架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湾区智库进入了整合共进的新时代，也意味着“湾区建设，智库先行”逐步落实为治理实践。多年来，三地智库紧密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了科技、教育、传媒和金融等领域的区域协同进程。学界对大湾区智库建设与区域协同发展主要从三个方向展开研究：讨论智库的定位^[3]、特征和建设路径^[4]；以具体地区为对象，如香港^[5]、澳门^[6]、珠海^[7]等，探索其智库建设问题；论证不同类型智库的建设策略，如高校智库^[8]、媒体智库^[9]等。智库建设和区域发展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然而，

当前的研究较少基于大湾区的整体论视角对区域性智库建设展开研究,缺乏区域发展的因素分析。因此,本研究以大湾区智库的区域塑造功能为切入点,剖析湾区智库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探索其实践障碍,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从中观视角回应湾区智库建设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一、大湾区智库区域塑造功能分析和实践探索

以智库建设来塑造和推动区域发展,在国际上已经有相应的治理实践。智库的塑造功能,往往体现在为多元治理主体提供政务决策咨询和公共事务分析,如美国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BACEI)通过战略决策咨询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发展方案;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通过大型区域规划,有效促进了“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的东京湾区发展规划则为该地区环境和市场资源的合理开发提供了科学思路^[10]。除了国家内部的治理,在国际之间的区域治理层面,智库的塑造作用也十分重要。如菲律宾的国际对话倡议组织(IID)和人民政策中心(Ople Center)等多家智库为东南亚的安全、人权和环保等方面提供了资政建议^[11];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SIIA)和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ISEAS)等新加坡智库也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中担任了建言献策者、政策解读者和合作参与者等多种角色^[12]。

作为知识生产的专业机构,以智库的知识建构来塑造区域合作共识是协同治理的创新思路。在现有实践中,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是大湾区智库建设最值得借鉴的参考对象。这家成员覆盖全体东盟国家的智库联盟,通过“知识供给—知识扩散—促进政策转换”的工作模式,成功塑造了具有影响力的东盟地区论坛,进而对东南亚地区的制度生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3]。大湾区虽然是国家内部的区域概念,但该区域的协同发展更多是由治理主体的合作来推动,其内部治理层级与治理要素之复杂,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三个次国家行为体的区域联盟,这与东盟地区类似。此外,大湾区作为一个国家内部区域,其智库建设还承担着推动区域发展的

重要使命。创新结构理论的三螺旋模型认为“政府、高校和企业”三者的相互作用是促进知识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动力,这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该理论视角很好地解释了“智库如何推动区域发展”的问题。而作为智力支持者和知识提供者,智库与高校的职能存在部分交叉,很多智库也依托于高校设立,两者在该模型中基本类同。因此,结合ASEAN-ISIS建构主义区域塑造模式和创新结构理论的三螺旋模型,本研究基于大湾区的特殊性提炼出智库的区域塑造功能模型(如下图),对智库发展的现状加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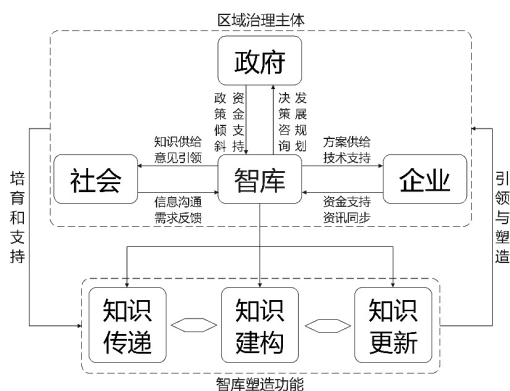


图 智库区域塑造功能模型

(一) 知识传递功能：整合信息，汇聚共识

信息同步是区域协同发展的认知基础。作为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中介主体,智库是知识传递与整合的枢纽,可以促进区域治理中信息的流动和共享。对于政府而言,智库能够提供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全面信息和深度剖析,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增长数据、政策影响程度以及科技创新趋势等。这些信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丰厚的知识积累,使其更加符合民众需求,有助于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公众接受度。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广东新质生产力2023发展调研报告》就是很好的例证。该报告以案例调研和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广东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厘清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现状,为后续的经济建设筑牢信息基础。

对于企业来说,通过智库提供的行业报告、市场分析以及政策解读等信息,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趋势和政策环境,为其发展规划和战略调整提供指导。这不仅帮助企业减少了因信息不

足而造成的市场风险,也为其把握发展机遇提供了可能。例如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广州市汽车产业发展:进程与挑战》调研报告就是许多汽车企业了解行业动态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参考。此外,智库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咨询服务,如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为企业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链构建的业务,其中为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和广汽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定制的发展规划就是参考案例。

对公众而言,通过智库的研究,社会各界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政府决策的目的、意义及其对社会各界的影响,从而增强政策的社会基础和公众信任。“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刚提出时,大湾区居民对该地区未来的发展定位和融合趋势缺乏足够的认知,社会各界在区域建设上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14]。适时,惠州报业传媒集团在旗下的《惠州日报》刊登了三篇评论文章,论述了惠州在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共鸣^[15]。这很好地体现了媒体智库运用渠道优势,促进信息流动和共识形成的知识传递功能。

(二) 知识建构功能:智力支持,提供方案

科学的治理策略可以为区域协同发展起到指引作用。所谓知识建构功能,即在充分整合信息与汇聚共识的基础上,智库可以为治理主体提供产业规划、建设方案和治理策略等智力支持,建构支撑区域发展的系统性知识。在区域治理实践中,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各类治理主体往往囿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无法从全局的角度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智库则可以在充分了解各群体诉求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调研分析,立足全局,以独立的第三方视角探索兼顾各方利益和发展效率的方案,实现帕累托最优。

智库的知识建构功能在大湾区的建设中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从区域层面看,粤港澳三地迥异的经济社会背景决定了差异化的发展需求,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区域发展规划制定时必须掌握好地区间的动态平衡,才能实现大湾区内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提升发展效率。因此,三地智库针对跨区域问题展开联合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中国粤港

大湾区改革创新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报告》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报告》等重量级的研究成果,都是由跨地域、跨机构的科研团队合作而成。这些报告在不同层面对大湾区发展的核心问题开展了调研和考察,并提出了趋势预测和施政建议,提升了政府施政的科学性。

从领域层面看,大湾区内不同领域之间存在较大的资源差异和治理矛盾,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科技创新与就业结构的调整等问题都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和策略来应对。为此,“跨领域、多类别”的智库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相互学习和知识分享,智库可以促进多元化的视角融合,从而发现和解决交叉性难题,为区域治理提供灵活而精准的解决方案。举办论坛和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是推动跨域智库联合研究的重要形式,在综合性学术活动之后,智库们可以针对某项课题组建联合小组,进行深入探讨。

(三) 知识更新功能:实效评估,守正创新

区域协同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持续转变,智库还须具备知识更新的功能,以快速响应事物发展、更新信息和传递知识,保障智库知识的时效性和科学性。其知识更新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环节:一方面,智库作为各类治理主体智力支持的重要来源,其提供的研究成果必须具备高度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智库在将研究成果提交给政府、企业和社会其他相关主体之前,必须对成果的各个方面进行严格的综合性评估分析,如数据来源的准确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结论的逻辑性以及建议的可行性等等。这种评估程序在高校智库中较为成熟,如项目组在开题和提交时均会举办专家论证会,通过内部评审、同行评议等方式,确保研究成果在理论、方法和结论等方面的严谨性。此外,智库需要定期对其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进行跟踪和学习,以确保评估标准的时效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评估智库的研究成果不应局限于理论层面,衡量其在政策制定、企业决策以及社会实践中的应用成效更为重要。智库的事后评估存在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与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紧密合作,获取第一手的实践反馈,进而

对研究成果进行实时调整和优化；其二是通过资料检索、民意搜集和社会调研等社会观察的方式，识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种基于实践的评估和反馈机制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也有利于促进知识的更新迭代，提升研究的精确性。

智库的知识更新，是一个多项互动、循环持续的过程。而持续性的科学性评估和实践效果评估，不仅要求智库建立起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有效沟通渠道，确保信息的双向流动和知识的共享，还要求智库不断探索和创新评估方法，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评估效率和精确性，以适应区域协同的纵深化推进。智库的知识建构，始于知识传递，又指向知识传递，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类主体多向互动的过程中，三者共同塑造了区域协同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模式。

二、大湾区智库落实区域塑造功能的现实困境

随着大湾区智库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智库的塑造作用也逐步显现，对区域协同与可持续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大湾区智库已超过450家，涵盖政府智库、高校智库、媒体智库和社会智库四大类型，各自发挥着独特作用。政府智库在政策制定与区域规划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和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等，这些智库为政策制定、实施与优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高校智库依托丰富的学术资源与研究能力，专注于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香港大学香港经济研究中心和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等高校智库通过产学研结合，推动政策创新和国际学术交流。媒体智库则利用强大的传播平台和舆论引导作用，增强公众对大湾区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这类智库主要依托大型传媒集团建立，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深圳报业集团，通过矩阵化的媒体平台，迅速传播政策信息并引导舆论。香港的凤凰全媒体研究院同样通过其深入的媒体分析与传播能力，成为区域议题讨论的重要参与者。社会智库以其灵活的组织结构和广泛的研究领域（如创新经济、社会治理、文化发展等），提供了创新的政策建议和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代表性机

构包括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腾讯研究院等，它们凭借其高度灵活性和跨界合作能力，迅速响应政策需求，并通过跨领域协作为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前瞻性建议。然而在实践中，大湾区智库区域塑造功能的实现也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现实阻碍，具体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分布结构失衡，信息传递受限

在大湾区内，智库机构的发展和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失衡，这不仅影响了智库研究的深度和全面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区域内共识的形成。

其一是区域分布的失衡。在大湾区内，专业性和影响力较强的智库主要集中在几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和研究资源丰富的城市，如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相较之下，大湾区的其他城市如珠海、江门、肇庆等，智库实力普遍较弱，甚至有的城市完全没有专业的智库机构。这种不均衡的分布格局导致了区域内智库研究的视角和关注点过于集中，无法全面覆盖大湾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广泛性和实用性。

其二是类型分布不均。从智库类型的分布来看，政府智库和高校智库作为两大主流类型，依托于政府和学术机构的资源优势，占据了智库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企业智库、媒体智库和社会智库等新型智库的发展则相对滞后，数量有限，且地区分布严重失衡。在香港和澳门，媒体智库较少，而在广东省内部，社会智库的发展也较为缓慢。

发展类型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智库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政府智库和高校智库往往更侧重于国家政策、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等宏观领域，而较少触及企业经营、社会现象和公众日常等具体话题。相比之下，企业智库、媒体智库和社会智库则更关注市场动态、民生热点等微观议题。这种研究偏好的差异导致了智库对区域内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存在局限性，进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导向性和应用范围。而不同类型智库的数量和体量差异又放大了研究成果的分化，从而阻碍了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区域内共识的形成。

（二）顶层智库缺位，智力资源分散

在大湾区智库发展的宏观格局中，顶层设计

和统筹协调功能的缺位成为制约智库更好发挥区域治理支撑作用的关键因素。尽管大湾区智库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区域智库合作的网络基础,但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其在整合智库资源、统筹研究方向和组建合作网络等方面的功效尚未完全显现,制约了大湾区智库整体的功用和效能。

首先,大湾区智库联盟的领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智库于2019年成立了大湾区智库联盟,旨在对区域内的智库资源进行有效整合^[16]。然而,目前智库联盟的作用仍局限在交流与合作层面,主要作为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的平台而存在。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性智库主体,其应当肩负起主导大湾区智库建设和研究方向的责任,承担统筹规划、促进联合研究和影响政策制定等方面的职能。目前该组织部分职能的缺位,一方面是受到政府、企业等各类主体对智库联盟支持和资助不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智库联盟自身功能定位不明确、机构设置不规范和活动规划不清晰的体现。

其次,统筹协调下的区域立体化交流网络尚未建立。目前大湾区智库的交流仍以智库之间的点对点沟通为主,缺乏统筹规划下的系统合作安排。这种自发性的合作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促进信息交流的作用,但对于需要多方智库联合攻关的复杂问题,其合作效率和研究深度捉襟见肘。缺乏系统规划与协调的立体化合作网络,限制了智库在研究设计、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影响了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深刻性。

最后,交流网络支撑下的人才流动机制亟待完善。当前大湾区智库人才在行业内部的发展和晋升并不通畅。由于社会对智库工作的了解和认可度不足,智库人才的价值和独特性难以得到充分认可,从而导致人才的职业发展空间受限。这一点在香港较为明显,社会智库的研究工作往往无法为相关人才增添履历厚度和行业经验,导致行业精英不愿意前往智库就职,阻碍了智库人才的培养。此外,智库人才在不同类型智库之间的流动受阻。由于当前不同类型的智库间仍存在较为明显的行业壁垒,除了政府智库和高校智库之外,其他类型的智库人才囿于专业、平台和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缺乏畅通的人才流动机制,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智库研究多元化的进展,影响了智库对交叉问题的深入探索。

(三) 信息公开不足,评估监测缺乏

在大湾区智库知识更新的过程中,信息公开不足和评估监测体系缺失成为两大突出问题,这不仅影响了智库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信任度,也制约了智库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应用推广。

一方面,大湾区智库科研成果公开程度普遍不高,特别是政府智库和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更多地停留在内部流通阶段,缺乏对外公开的渠道和机制。作为距离政策制定者最近的智库类型,这两类智库较为封闭的信息传播模式不仅限制了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也阻碍了公众对智库工作的了解和监督。相对而言,社会智库和媒体智库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较好,他们通过网站、社交媒体和公共讲座等多种方式主动公开研究信息和成果。然而,由于信息资源和研究力量不足,这类智库提供的智力支持功能有限。即使其信息公开程度较高,也难以产生预期的社会影响力。

另一方面,大湾区智库研究的评估和监测体系尚未建立,智库的考核评定与激励机制亦需完善。智库的研究能够被委托方和受众采纳,进而转化成社会实践,是决定智库塑造功能的关键。从大湾区的整体视角看,智库与企业创新的互嵌不足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根源在于当前大多数智库成果缺乏科学规范的事前论证与事后评估机制,其质量和影响力难以得到有效衡量。这不仅影响了智库成果的转化率,也制约了研究质量的提升和人才激励举措的完善。此外,智库的考核评定与奖惩机制的匮乏也无法激发起研究热情和创新精神,制约了知识更新功能的运行。

三、大湾区智库发挥区域塑造功能的优化路径

在智库建设和区域发展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其内涵可解构为治理主体、分布结构、互动机制和塑造效能四个层面。为了解决智库推动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对智库的区域塑造功能加以优化:

(一) 机构优化:加强湾区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

加强智库自身建设是其他所有改良措施的前

置条件,也是保障后续治理行为的本体基础,具体体现为湾区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

第一,提升知识管理能力。作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机构,知识管理能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17]。目前,大湾区智库缺乏完善的数据库和知识库,信息平台建设仍不完善^[18]。各类智库应率先建立和维护自身的知识库系统,高效管理学术文献、政策报告、大数据资料和案例库等信息资源。其次,智库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工具,提高知识的整合、分析与应用能力,推进数据驱动型智库建设的进程^[19]。最后,智库还需建立体系化的知识循环机制,积极与各类区域治理主体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建立面向公众的媒体宣传渠道。

第二,突出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大湾区智库的研究产品应该紧密结合“一点两地”的区域实情和发展需求。一方面,既要兼顾国家和地区的双重研究导向,在深刻解读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湾区的发展优势和治理难题,如优势产业的互补嵌套、多元文化的交互碰撞和人才优势的深度挖掘等,并将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另一方面,要“立足湾区、面向国际”,在强调研究在地化的同时,积极关注国际发展趋势,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与舆论影响力。此外,针对国内外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如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等,立足于治理实践,提炼出独特的“湾区方案”。

第三,完善人才培养与交流体系。人才是知识生产的基础条件,也是知识更新的重要动力。湾区智库要依托立体化的智库合作网络,建立起稳定的人才流动机制。通过学术会议、访学研讨、项目合办和交换挂职等方式,拓宽智库与社会各界的“旋转门”路径,保障人才的多元化。其次,面对复合性治理难题,部分实力雄厚的大型智库应当打破学科和领域的局限,通过与高等教育机构合作、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以担任统筹整合的角色。同时,智库内部应当构建多元化的人才考核标准与评价体系,保障专业人才、特殊人才和综合性人才的合理配比。最后,智库可以联合政府、媒体和产业界,加强智库人才的社会化宣传,改善智库人才的社会

定位,增强智库人才的职业信念和价值感。

(二)结构优化:构建以智库联盟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

良性的智库分布结构和关系网络是应对“信息传递受限和智力资源分散”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以智库联盟的建设为核心,构建立体化的区域智库合作网络,并着力推进区域智库结构的科学分布,从而实现资源的有序整合,凝聚发展合力。

第一,发挥大湾区智库联盟的主体领导作用,立足全局,统筹协调。首先,明确其角色定位,通过章程设置、组织建设和机制构建等方式,增强统筹协调能力,使其成为连接各类智库的信息枢纽,以及促进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和联合研究的合作平台。其次,智库联盟应定期组织区域内智库的交流活动,包括学术研讨会、主题论坛和专家座谈会等,并建立统合所有城市的信息分享平台,促进知识的共享。同时,智库联盟还应承担审视和评估智库研究和项目落实的职能,确保研究项目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避免资源的浪费或项目的悬置。最后,智库联盟还可通过定期发布区域智库发展报告、智库研究趋势分析等材料,为区域智库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导。

第二,在智库联盟的统筹协调之下,构建立体化的区域智库合作网络。该合作网络不仅要在地域上囊括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还要在领域上涵盖政府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智库、科技智库和社会智库等多种智库类型,形成一个广地域、多层次、宽领域的智库格局体系。依托立体化的合作体系,智库机构可以在处理跨城市、跨领域的复杂问题时,调动更多的资金、人力和技术资源,形成研究合力,为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

第三,区域治理主体应结合实际情况,优化区域智库的分布结构:一方面要帮助和扶持智库力量匮乏的城市加强地方智库的建设,另一方面要对企业智库、媒体智库等社会性智库给予更多的扶持和鼓励,从而达到优化区域智库结构的目的。对于智库力量薄弱的城市,地方政府、智库联盟等主体可以通过提供经费支持、项目合作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促进这些地区智库的成长。而对于社

会性智库,则应当尝试建立合作平台、畅通共享机制和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励它们在社会治理、文化传播和民生舆情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机制优化: 建立研究成果的评估和监测机制

研究成果的监测和评估是智库进行知识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能有效推动研究的科学化与精细化,还是促进成果落地与转化的催化剂。当前的湾区智库在知识更新功能方面仍缺乏成熟稳定的配套机制,影响了智库塑造功能的实现。

第一,加大研究成果的信息公开力度。信息公开机制是维护智库透明度的制度保障^[20],也是成果评估与社会监督的程序前提。目前大湾区智库普遍存在透明度不高、信息公开渠道匮乏、信息公开内容单一和透明度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要推动各类智库加大研究成果、交流活动、业务情况等内容的信息公开力度,提升内容的全面性、时效性和可读性;建立或优化公开平台,着力运营好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降低社会各界对智库内容的获取难度;将智库的信息公开情况纳入智库考核范围之内,并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以起到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第二,建立成果评估机制和智库评价机制。智库研究成果的评估一般通过社会化观察和指标化评估两种方法。大湾区智库的社会化观察主要依托于委托方和公众的监督,指标化评估则基本处于悬置的状态。因此,智库应建立全面的成果评估机制,包括在事前评估中设定系统的定量指标(如引用率、阅读量等)和定性指标(如政策影响、创新程度等),并邀请专家学者组织评审论证会;以及在事后评估中开展社会调研、意见征集和行业交流等活动,了解实践成效和社会评价。此外,大湾区智库联盟还需要建立起对各类智库的评价机制。而由于大湾区智库治权分散,智库联盟应当承担起评价主体的职责,成立专题工作小组,周期性地对粤港澳三地的智库进行评价与奖惩工作。

第三,拓宽社会监测和公众监督的反馈渠道。公众监督不仅是提升智库透明度和成果适用性的关键,还是保障智库独立性的有效手段。其实现也依赖于多种渠道和方法的综合应用。智库应灵

活运用多种新媒体资源,拓宽智库和社会公众接触的线上沟通渠道。智库还可以定期举办公益讲座、主题沙龙和政策解读宣传会等线下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以便于更好地收集公众意见。与此同时,智库还要健全公众意见的传达机制和转化机制,让社会的意见可以真正推动研究的深化,使得监督落到实处。

(四) 效能优化: 以智库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建设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21],目前已经成为协同发展的现实驱动因素。智库建设促进区域发展的关键,在于其能否指导和协助相关行业构建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进而助力区域协同。因此,智库的塑造效能最终要以大湾区“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程度来体现。

第一,加大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智力支持力度,扩大相关研究的资源倾注比例。首先,在智库联盟的领导下,大湾区智库应当加强对于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生物制造、商业航天和生命科学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政策研究与行业研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打牢知识基础。其次,大湾区智库要增强与相关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获取行业实时数据,为研究人员的创新提供素材。同时,大湾区应以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和项目委托等方式鼓励科技智库的建设,弥补当前大湾区以政府智库和高校智库为主的结构劣势^[22],直接服务于区域新兴产业的培育。

第二,增强智库研究的实地转化效率,推动产业发展与变革。一方面,智库主动寻求与行业领袖和创新企业的合作,联合探索研究成果的应用场景,尽量提供全链条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也要提供必要的支持,为成果转化提供政策条件和资源扶持。例如,通过设立创新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与智库合作,提高研究成果在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和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应用程度。

第三,结合大湾区的国际交流优势,增强相关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大部分高新行业是国际共同关注的领域,大湾区智库应借助香港和澳门在全球

产业链中的区位优势,积极与国际智库、高校和社会组织合作,通过开展跨国研究项目和参与国际研讨会等方式,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行业经验,构建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此外,大湾区智库也要增强研究成果的海外影响力,通过主办国际性学术期刊、鼓励智库成员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运用国际化社交媒体等方式,宣传“湾区经验”和“湾区模式”,吸引国际企业和资金的关注度,为大湾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增添更多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软硬联通, 协同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发布五周年侧记 [EB/OL]. <http://www.news.cn/gangao/20240220/d9ab49ac77e24ed0a3530e8f12d51981/c.html>, 2024-02-21.

[2] 薛澜. 智库热的冷思考: 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 (5).

[3] 范爽.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智库建设的定位与路径探析 [J].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2021, 5(5).

[4] 赵恒煜. 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发展特征、问题及趋势研究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2, 7(6).

[5] 余晖. 香港半官方教育智库的体系、特征与功能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6, (12).

[6] 刘景松. 大湾区视野: 粤澳智库建设探析 [J]. 粤海风, 2020, (5).

[7] 张晋鹤, 林婷.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地方智库的发展研究——基于珠海市智库建设的调查分析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2, 7(1).

[8] 郭文曦. 大湾区高校智库建设工作探索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1, 20(16).

[9] 汪金刚, 彭婉珍. 粤港澳大湾区媒体智库发展现状与优化路径研究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3, 8(2).

[10] 杨爱平, 林振群. 世界三大湾区建设“湾区智库”的经验及启示 [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20, (4).

[11] 高峰, 陈菲. 菲律宾智库在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3, 8(6).

[12] 王蓉, 陈菲. 新加坡智库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中的作用探究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2, 7(5).

[13] 陈子恒, 姜昊. 建构主义视角下东南亚智库塑造地区制度的研究——以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例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3, 8(3).

[14] 林志鹏, 孙海燕. 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建设的定位与路径 [J]. 决策探索, 2019, (3).

[15] 于泽, 何万明. 发挥主流媒体智库优势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惠州报业传媒集团实践为例 [J]. 城市党报研究, 2019, (7).

[16] 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粤港澳三地智库签署大湾区智库联盟框架协议 欧阳卫民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 [EB/OL]. https://www.gd.gov.cn/gkmlpt/content/2/2524/mpost_2524059.html#43, 2019-06-27.

[17] 刘春艳, 谢学勤. 基于知识生态理论的新型智库协同知识管理能力维度与要素构成研究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3, 8(6).

[18] 黄晓斌, 彭佳芳. 广东地方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现状调查与分析 [J]. 图书馆论坛, 2020, (8).

[19] 李刚, 陈霏, 苏丹淳, 等. 智库建设范式的转型: 从专家驱动到数据驱动 [J]. 图书与情报, 2023, (5).

[20] 中国智库透明度研究课题组, 朱旭峰, 韩万渠. 中国智库透明度报告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7, 2(1).

[21] 周文, 叶蕾.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 (2).

[22]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与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课题组. 2018CTTI来源智库发展报告 [R].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 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 2018.

作者: 张正良,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深圳大学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张树剑, 深圳大学全球特大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钟晓媚